

类书的文献价值

洪湛侯

我国的类书，起源很早。《尔雅》十九篇，有属文者，有属事者，有属器物者，实为最古的分类之书。司马迁作《史记》，将有关学术制度的史料编为“八书”，开启了以类隶事的类书之体。自汉以还，辞赋盛行，逞博炫奇，辞藻堆砌，已可视为类书的早期胚胎。迨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王象、刘劭奉诏撰辑《皇览》，采集经传，以类相从，数岁成，藏于秘府。可惜这部规模宏大的类书到唐代末年便已散佚。南北朝时期编纂的类书已很多，但都没有能流传下来。类书最初的编纂目的，不过汇辑资料，供省览之用；它之被作为工具书使用，那是唐以后的事情。唐宋时期，经济文化繁荣发展，同时科举制度盛行，迫切需要类书提供典故和辞藻，因而对类书的制作和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据历朝艺文志、经籍志著录，自六朝至清代，类书约有六百余种，大部分已经散佚，今存者约有二百种左右。

类书所收的材料非常广泛，包括历史事实、名物制度、诗赋文章、成语典故、骈词俚语、自然知识等各个方面。《四库提要》类书小序说：“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这段话正好说明类书内容的广泛性，反映出类书的文献价值是多方面的。尤其是一些大型

类书，山包海汇，综合各类，把它看作古代文献的宝库，并不夸张。从今天文史研究的角度看，类书的文献价值是很高的，约言之，有以下一些方面。

（一）查找各类资料

查考史实的专书很多，一般都从二十四史——即通常所谓“正史”中去查。正史分本记、列传、表志等部分，往往一事分见多处，材料分散。类书采辑各种史料，分类排比，资料集中，一索即得。例如有关历代“蝗灾”的文献，《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庶征典》一百七十九卷至一百八十二卷蝗灾部就汇集了自周桓王开始到清康熙为止三千年间各朝史书所载蝗灾资料共计三百四十则，这些原始材料散见各书，现在全部辑录在一起，查检就十分便利。

唐宋时期的大型类书，保存遗文佚书尤多，资料极为繁富。例如《册府元龟》，它本身就是一部史料性的类书，全书九百余万字，汇辑了自上古至唐、五代十七史的材料，所辑都是北宋以前的古本，唐、五代的史实尤为详备，特别是所引五代史料如诏令奏议等大都失传，《册府》所引，多整篇整节照录原文，文中俚语，亦未删节，从而保存了不少珍贵的历史资料和语言资料。

王应麟是宋代的博学家，他编撰的《玉海》，保存了不少早已散佚的史料，所述宋代掌故，悉本诸实录、国史、日历，多为后世史志所未详。其书征引经史子集，百家传记，无不胥具。每遇异说，往往博采诸书加以考证，内容之精博，足与杜佑《通典》抗衡，为研究宋史提供了不少很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对《玉海》备极称扬。

类书中收录了很多典故，有的常较通常出处更为完备，征引类书，往往可以得到比较圆满的解答。例如李清照《多丽》词中

提到的“似愁凝，汉皋解佩；似泪洒，纨扇题诗”其中“汉皋解佩”一典，原为郑交甫遇仙女的故事。《太平御览》卷八〇三引《列仙传》：“郑交甫将往楚，道至汉皋台下，有二女，佩两珠，大如荆鸡卵，交甫与之言，曰：‘欲子之佩’，二女解与之。既行返顾，二女不见，佩亦失矣。”按今本《列仙传》卷上云：“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游于江汉之湄，逢郑交甫，见而悦之……遂手解佩与交甫。”这里仅言“江汉之湄”而未提“汉皋台下”，亦未言“明珠之佩”。因此援用《御览》引文来解释“汉皋解佩”的典故，才更加符合词义。

今天，我们正在进行各种类型的词书编写工作，从类书中查找各类材料，亦大有裨于实用。类书中保存了不少遗文佚诗，可作语文词典立目的材料，如《初学记》卷十八引应璩《杂诗》：“箠瓢恒自在，无用相呵喝。”《永乐大典·小孙屠戏文》：“你如今与我收拾行李，和我一同去还心愿，也免在家闲争合口。”上文的“呵喝”和“合口”都可据以立目。“呵喝”是大声喝止，“合口”犹言口角、争吵。在词书的释义方面，有选择地征引类书材料，往往可以补充义项。如“修养”一词新近出版的一些词典都把它释为道德品质或知识技能方面的素养，有的释为指儒家以内省方式培养个人品德的方法，经查《太平御览》卷六七三“道部·仙经下”引《太微黄书经》：“方法者，众圣著述丹药秘要，神草灵芝，柔金水玉，修养之道也。”因此，“修养”也是道教称炼丹服药养生求仙的方法。这就丰富了词汇的内容。再如“面首”一词，一般词书皆引《资治通鉴·宋纪》明帝为山阴公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的记载，释为男宠、男妾。查《太平御览》卷三六五“人事部·面”引蔡邕《女戒》：“夫心犹面首也，一旦不修饰则尘垢秽之。”参看鲁迅《古小说钩沉》引《集异记》亦云：“日暮忽见一人着乌裤褶来，取火照之，面

首无七孔，面莽倥然。”故知“面首”本义应为面容，容貌。再如“封”字，《太平御览》卷九四七引《方言》：“楚郢以南，蚁土谓之封”，《广雅·释诂三》：“封，场也”王念孙疏证：“天将雨，则蚁聚土为封以御湿。”而今本《方言》“封”作“埤”。可见《御览》引文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释义资料，为“封”字增补了“积土成堆”这样的一个义项。又如“封壤”一词，《太平御览》卷九四七引《符子》：“群蚁曰：‘彼（指东海之鳌）之冠山，何异我之戴粒，逍遥封壤之巅，伏乎窟穴也。’”根据《御览》引录的这段文字，不但可以概括出“封壤”有“土堆”的意思，增加一个义项，另外又可以引作“冠山戴粒”这一成语的语源。（按：《辞源》修订本“冢”部已另据《艺文类聚》卷九七引《符子》立目，文字与上述《御览》引文略同。）在词书引例方面，利用类书的分类目类或大型类书所附的词目索引去查找材料，常会大有所得。如“吴牛喘月”一般词书常以《说新语·言语》：“臣犹吴牛，见月而喘”一节为最早例证，经查《太平御览》卷四“天部”引《风俗通》，有“吴牛望见月则喘……”的记载，这样例证就可以提前二百多年。从上述几点看来，从类书中查找材料，为我们编写新词书服务，无论选词立目，解释词义，征引书例等方面都将大有可为。此外，还可以利用类书重核引文，使它更加切合原文原意，这样，也可以进一步发挥类书的功用，使它为今天的文史研究工作服务。

（二）查考事物源流

研究历史、特别是文化史、科学技术史，常常需要溯源穷本，考证有关事物的起源、发展和变革的过程。这除了悉心考察各种实物、文物以外，还要查考有关文献记载。有些关于事物起源的资料，散见于各种古籍之中，把这些资料分门别类地集中起

来，查检就比较方便。另外在一些综合性的大型类书中也常辑录了考证事物源流的专门章节，这些都颇有助于检索。例如我国古代科学家张衡创造浑天仪和地震仪的原著，早已亡佚，但在《太平御览》卷二天部“浑仪”目内就有一段记载，为《后汉书·张衡传》所无，是非常珍贵的原始资料。又如《初学记》卷二十七《绢第九》引《晋故事》：“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绢三匹，绵三斤……”这一段记载，是研究西晋田赋制度的重要史料，在《晋书·食货志》里却没有记载，而《晋故事》原书又早已失传，因而更值得珍视，所以常为历史研究者所称引。“寒食节”的掌故和来历，民间流传已久，一般都认为介子推的故事。而《初学记·岁时部下》“寒食”条，不但引录了《邺中记》“寒食断火起于〔介〕子推”的说法，又进一步论证了“禁火盖周之旧制。”指出“据《左传》及《史记》并无介子推被焚之事。按《周书》司烜氏仲春以木铎循火禁于国中。注云：“为季春将出火也。今寒食准节气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则禁火盖周之旧制。”这就比一般词书征引的材料要丰富，翔实得多了。

要弄清一些典故性的词语，查一般词书往往无法得到解决。例如“封羊”和“封鹅”两词，在一般词书里就无法查到。《太平御览》卷九〇二引《凉州异物志》：“封羊其背如驼”，可知封羊是一种大羊，那么，“封鹅”是不是动物呢？《玉海·食货·农书》：“宋朝天禧四年……又出绘龙封鹅祈禳秘法，令长吏遵行，劝农之道备矣。”并指出其法为：“择灵祠为坛，取白鹅割项盛血，并鹅奠之。次日，俱于坛前瘞之。”另外，在《渊鉴类函·鸟部·鹅》中也有类似记载，可见“封鹅”指的是宋代用鹅祈求雨雪之法，而非专指其鹅。

宋代高承编撰的《事物纪原》是流传下来比较早的一部考证

事物起源和沿革的专门类书。自博奕嬉戏之微，鱼虫飞走之类，一一考其来源，特别是书中对于一些生活器物、食品等等选录较多，诸如雨伞、熨斗、胡床、纸、笔、爆竹、馒头，汤饼、葡萄、大蒜、胡麻之类，均加收录，考其来源。此外，《事物纪原》中还有不少资料可提供研究科技史的参考。如卷八“小车”条云：“蜀相诸葛亮之出征，始造木牛流马以运饷，盖巴蜀道阻，便于登陟故耳，木牛即今小车之有前辕者，流马即今独推者也，而民间谓之江州车子。按后汉郡国志，巴郡有江州县，是时刘备全有巴蜀之地，疑亮之创，始作之于江州县，当时云然，故后人以为名也。”今按《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以木牛运”；又云“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但至今我们还不能确考“木牛流马”的图形，《事物纪原》所云，可备一说。

宋代官制冗杂，《宋史》所载，不过仅存其名，当时诗文所称，后世多不知其为何官，宋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其后集对宋代官制多有记载，阐述详明，所采宋以前古籍，今多散佚，尤为为考证之资助。除了官制以外，不少类书中列有“制度”的专章。例如“同文馆”一词，按《清朝续文献通考·学校十四》记载为清代学馆名，而宋王应麟《小学紺珠·九·制度》记载：“同文馆”为接待青唐、高丽来使之所，是宋代设置的掌接待外国来使的机构。根据《小学紺珠》所载就使“同文馆”一词的含义，更加确切和完备。此外，清魏崧编《壹是纪始》考证“书院始于唐”，“国子监始于隋”，引证都根据文献记载。陈元龙《格致镜原》考证饮食、布帛、文具、武备、日常器物以及花、木、鸟、兽、昆虫等等，这些记载事物的资料，大多录自原书，所采经、史、杂记、野乘都一一注明出处，其中记雕版印刷的起源和发展，对了解我国印刷的历史，就很有价值。另外还有一

些图谱性的类书，从图谱和文字两方面来阐述事物的源流，如明王圻《三才图会》，明章潢《图书编》都属于这一类。《三才图会》汇辑古书图谱，包括古代文物和人物图象，加上文字说明，其中有些根据流俗相传的形状绘制的则不尽可信。全书分天文、地理、人物、时令、宫室、器用、身体、衣服等十四门，其“器用”门就绘制了古代刀枪剑戟、火箭、飞炬、连弩、铁鞭、留客住等各种兵器的形状，罗列的品种较多。总的来说，此书收罗广博，但总嫌芜杂不精。《图书编》也是汇辑诸书图谱的类书，它辑录古书中有图可考的资料，加以说明，分类编排，颇便检索，其地理、人道二类有很多反映明代政治社会状况的资料，可补史志所未备。此书在材料考核方面超过《三才图会》。图谱对编写工具书作用很大，词书、百科全书都需要配图，它既可以补充文字叙述的不足，又可以增加读者阅览的兴趣。现在英美各国工具书都非常重视配图，用图来引导青年人看书。国外很多工具书都已采用彩图，向精益求精的方向在发展。日本编的图解百科全书，图的比例占得很大。我国的《三才图会》直到目前为止，各国工具书未见采用，唯日本编的百科全书和词书却采用了，可见他们对图谱资料的重视。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图谱资料丰富多彩，但我们自己发掘利用还很不够。类书中保存的图谱是一个重要方面，今后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从中发掘一些有用的资料，为编写工具书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三）辑录古书佚文

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古代典籍，散佚很多。元代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经籍考》序中说：“汉、隋、唐、宋之史，俱有艺文志。然《汉志》所载之书，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复如是。”书籍的亡佚率这样

大，考其原因：历史上多次改朝换代，社会动乱，往往造成书籍的散佚，牛弘、胡应麟所称古书经历“五厄”、“十厄”，是由于历代的“兵燹”、“祸乱”，但这些只不过是一方面的因素，我们还可以从传播书籍的方法和工具落后等方面找到更加直接的内在原因。在雕版印刷发明以前，书籍传播，都靠手写，客观上受到很大的限制，雕版印刷发明以后，卷帙浩繁的书籍因为无力开雕以致散亡的也很多。辑录佚书佚文的工作，宋代学者已渐开其端绪，明代辑佚的范围还比较局限，清代朴学盛行，辑佚工作取得显著成果。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安徽学政朱筠向清高宗奏请开四库馆，建议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古书，以备著录。清高宗采纳了朱筠的建议，着手编纂《四库全书》，先后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并录入《四库全书》及其存目中的佚书共五百十五种，还有虽已辑出，尚未及列入四库者，如《宋元两镇志》、《奉天录》、《九国志》等，也都是比较重要的典籍。今四库总目中表明“永乐大典本”的书，都是这次重新辑出的佚书。这说明《四库全书》一开始修纂就和辑佚工作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次辑出的佚书，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五百二十卷、薛居正《旧五代史》一百五十卷、郝经《续后汉书》九十卷，都为历史研究工作提供了大量的富有价值的文献资料。从《大典》中辑出的二十四卷《东观汉记》有不少材料可以补正范曄的《后汉书》。此后，徐松辑《宋会要》其中大部分材料皆辑自《永乐大典》，而这些史料十之七八是《宋史》失载的，由此亦可见其文献价值之高。

《永乐大典》正本毁于明亡之际，副本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大部分遭到焚毁和劫走，造成了研究中国文学艺术、历史、自然科学等各方面资料供应上的无可补偿的损失。建国以来，将从各方面征集到的七百三十卷《大典》残本进行影印。这些残本

中还保存了不少珍贵资料。如宋人吴懋的《种艺必用》和张福的《种艺必用补遗》，这是两部相当重要的有关农业和园艺的专门著作。元人薛景石的《梓人遗制》是我国古代有关建筑方面的专业用书，并附有详细的图和说明，可惜现在仅存的只有半卷了。《大典》收录了三十多种“南戏”，今天我们从残本中还可以看到《小孙屠》、《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等三种不同时期的“南戏”戏文，对于研究戏曲史很有参考价值。

辑录佚书佚文，除《永乐大典》以外，唐宋类书由于成书年代早，保存隋唐以来遗文秘典多，更为辑佚家所重视，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录佚书五百八十余种，王谟《汉魏遗书抄》辑录佚书一百余种，黄奭《汉学堂丛书》辑录佚书二百五十余种，洋洋巨编，大都取材于上述唐、宋类书。

《艺文类聚》引书一千四百三十一一种，皆隋以前的遗文秘籍，至今十不存一。以往类书侧重记事，有时摘引诗文，而《艺文类聚》则往往整篇引用诗文，很象一部以类相从的文集。明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以及清代其他辑佚家都曾从《艺文类聚》中发掘矿藏。鲁迅先生辑《古小说钩沉》和《会稽郡故书集》也都使用过《艺文类聚》。

稍后的《初学记》是唐玄宗时官修的类书，也保存了不少失传古书的片断，如唐初魏王李泰等修撰的《括地志》有五百多卷，是一部重要的古代地理专著，原书已失传。其“序略”仅见于《初学记·卷八·总序州郡第一》。从这些片断记载中还可窥见唐代贞观间政区的划分和州县的数目。清人孙星衍辑《括地志》八卷，就是取材于《初学记》的。

又如《太平御览》实际引书达二千八百种，今存者不过十之二三。清阮元序鲍刻《御览》云：“存《御览》一书，即存秦汉

以来佚书千余种矣”。《御览》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引书比较完整，多整篇整段的文字，而且注明出处，比起那些割裂文义，摘录词句的类书要有用得多。所以清代以来的校勘家、辑佚家非常重视《御览》，把它视为“辑佚的宝山”，把它誉为“类书之冠”，正是从它的文献价值着眼的。再如专门论述农业技术的《范子计然》《汜胜之书》比著名的古农书《齐民要术》还要早好几百年，在研究古代农业发展史上很有参考价值。这两种书都依靠《御览》的引用，今天我们才有可能看到原书的概貌。又如我国最早的医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早已亡佚，也都由于《御览》的征引，才得以重新辑出原书。

《太平广记》是一部专收魏、晋以迄宋初之小说、异闻、笔记的类书。四库存目归入小说家类。《广记》引书五百二十六种，所引之书，存佚各占其半。《广记》引书，卷帙少者往往全部录入，即未全采，材料亦往往多于今本。清代缪荃孙校补《北梦琐言》，就曾使用过《太平广记》，并辑出佚文四卷。鲁迅先生编写《中国小说史略》曾利用过《太平御览》和《太平广记》里的材料。《太平广记》保存了不少当时的口语词汇，对于研究语言学，词汇学和民间文学都很有参考价值。

《锦绣万花谷》亦宋代类书，征引古籍颇多，且一一俱注出处，颇有资于考证。《四库提要》云：“所录大抵琐屑丛碎……特其中久经散佚之书，如《职林》《郡阁雅谈》《雅言系述》《云林异景记》之类，颇赖此以存崖略。又每类后用《艺文类聚》例附录诗篇，亦颇多逸章剩什，为他本所不载。”对保存遗文佚事来说，这也是值得一提的。

一九五九年中华书局以丁福保的《汉魏六朝名家集》中的《魏武帝集》为底本，整理编印的《曹操集》，其中文集三卷，辑录了《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中曹操的

著述就有九十三篇（节）。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为词家一大宗，惜其著作多散佚不传。清《四库全书》所收，乃据毛晋《诗词杂俎》本《漱玉词》，祇收词十七首。而《全芳备祖》各门却录有李清照词六首，《全芳备祖》为记载植物的专门类书，其所录诗词，收入何门，即咏何物，如李清照《醉花阴》词有“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之句，则收入前集卷十二菊花门；《如梦令》词有“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之句，则收入前集卷七海棠门。在前人辑佚的基础上，近代继续辑得的李清照词祇有二首、诗一首，也都是取之于类书。赵万里先生从《全芳备祖》发现《南歌子》词一首，从《截江网》中发现《长寿乐》词一首。诗则有黄盛璋先生从《永乐大典》卷八八九诗字韵下发现的《偶成》。类书中收载了一些文学作品，在原集散佚以后，它给文学史的研究工作保存了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当然我们在辑录时还须慎重鉴别，如《永乐大典·梅字韵》有李清照梅诗五首，据专家考证都是《梅苑》中无名氏的作品，并非易安所作，不可鱼目混珠。庾信的《愁赋》，是辞赋中的名篇，历代诗词常常作为典故征引，但原文却很难看到。姜夔《齐天乐》：“庾郎先自吟《愁赋》，凄凄更闻私语。”胡云翼先生的《宋词选》注云：“庾信的《愁赋》今不传。这里愁赋一词可能是指他那些《哀江南赋》《伤心赋》《枯树赋》一类哀愁凄怆的作品”这条注文很值得商榷。按：倪璠注《庾开府全集》和严可均辑《全后周文》的确都没有收这篇《愁赋》，殊不知宋叶廷珪《海录碎事》卷九下却有之。所以，重视类书，勤于翻检，有些遗文佚篇才不致失之眉睫。

（四）校勘古书文字

古代书籍在雕版印刷术盛行以前，都依靠手写，因此很容易发生错误，以讹传讹。诸如字体缺谬，语句脱落，乃至错简，改

窜，衍文增句，无所不有。如果不能找到较好的本子进行校订，就很难考见古书原来的面貌。而类书所收的材料，是从当时尚存的书籍中辑录出来的，因而往往保存着失传古书的原貌。因此校勘古书的人，常利用类书校对异文，改定今本。在用手工抄写书籍的年代里，少一次传抄，必然要少一些讹误；在雕版印刷的年代里，少经一次翻刻，也可以避免一些错简和谬误。所以校勘工作应以古本为贵，过去一些著名的校勘学家重视唐宋类书，原因也就在这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曾谈到《艺文类聚》保存了不少隋以前的遗文秘籍，宋周必大校《文苑英华》多引是集，可见类书早在宋代就已作为校勘之用了。《二十四史》中《魏书》自宋南渡以后即有缺页，清严可均辑《全后魏文》，其中第三十八卷刘芳上书言乐事，引《魏书·乐志》仅一行，即注“原有阙页”。清代著名的校勘学家卢文弨亦认为此页已“无从考补”，其撰《群书拾补》时仅从《通典》补得十六字。而《册府元龟》五百六十七卷却载有此页全文，一字无损，得补《魏书》之阙。宋代编纂《册府元龟》之时，唐五代各朝《实录》多数尚存，故今《册府》所载，每与旧史不尽相同。清道光间刘文淇等校勘《旧唐书》曾借助《册府》，成绩卓著，由此观之，其文献价值自不待言。高邮王念孙、引之父子用古本和通行本书籍对校，从语音，词义和字形等方面考其异同，从而确定某为讹字，某是衍文，某属错简，在校勘学、考据学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其中很多都借助于古本类书。鲁迅先生校勘《嵇康集》，在序言中说：“复取《三国志注》……及陈禹谟刻本《北堂书钞》，胡纘宗刻本《艺文类聚》，锡山安国刻本《初学记》，鲍崇城刻本《太平御览》等所引，著其异同。”也正是因为这些类书编纂时间较早，保存了一些散佚的文献，所以使用价值较高。

上文提到的中华书局编印的《曹操集》中《孙子序》一文，

原辑于《岱南阁丛书》本《孙子十家注》，其中“孙子者，齐人也，名武，为吴王阖闾作《兵法》一十三篇，试之妇人，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后百岁余有孙臆，是武之后也”一段，为《岱南阁丛书》本所无，亦据《御览》辑补。《请追增郭嘉封邑表》辑自《艺文类聚》五十一。按《魏志·郭嘉传》亦载此表，惟叙述郭嘉事迹的“东禽吕布，西取眭固；斩袁谭之首，平朔土之众，逾越险塞，荡定乌丸；震威辽东，以梟袁尚”一段，为《魏志·郭嘉传》所无。《艺文类聚》引文，可为校补。

利用类书校勘古籍，当以宋代以前者为宜，明人所编类书，引文颇多臆改，难以为据，当然就是使用唐宋类书也不能一味盲从，即如《太平御览》所引，大多抄自前代类书如北齐的《修文殿御览》，唐代的《艺文类聚》、《文思博要》等，并非完全出于原本，因此其中也颇有沿讹袭误之处，引用亦须审慎。

我们在充分肯定类书功用的同时，也还要看到它的不足之处，《四库提要》类书小序云：“此体一兴，而操觚者易于检寻，注书者利于剽窃，辗转稗贩，实学颇荒。”当时由于类书的盛行，僇订摭拾之风大起，浅学之徒，便于剽窃，陈辞浮藻，敷衍成篇，以为作文治学之捷径。《提要》所谓“实学颇荒”者指此。今天我们不再依靠类书来撰写诗赋文章，此弊似已不复存在。然而对于类书本身编纂上的疏失、讹误，以及辗转相抄，以讹传讹等现象则仍应引起足够的注意。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云：“凡人多所见则少所误，少所见则多所误……故好德不如好色，许允事也，而近世类书以为许浑。韩魏公在扬州与客赏金带围，王珪与陈旭、王安石也，而近世类书以为王曾。晋、宋之事，且犹不免传讹，况乎三代以上固当有十倍于此者”。类书还有一种弊病是随意摘抄，连篇累牍而不注明出处，使人无从复核。

《四库提要》批评明代沈际飞的《类书纂要》：“是编于类书之内，稗贩而成；讹舛相仍皆不著出典，流俗沿用，颇误后来”确是切中其弊的。还有一些类书，虽已标注出处，但并不可靠，姑以《佩文韵府》为例：如“寻问”一词，见《北史·儒林·孙灵晖传》，而《佩文韵府》误作《北齐书·儒林·孙灵晖传》，《北齐书》虽有是篇，但叙述文字不同，且并未出现“寻问”一词。另外，我们在使用中发现《佩文韵府》引用材料标明出自《唐书》的，经核对，往往是《新唐书》而不是《旧唐书》（如日本《大汉和词典》、台湾《中文大词典》中的“射生将”条）；标明出自《齐书》的，往往是《南齐书》而不是《北齐书》（如《大汉和词典》《中文大词典》中的“府召”条），至于其他引文中的误删、遗漏、错简、破句乃至错别字那就更加举不胜举了。我国在解放前编写的某些词书和近代日本的《大汉和词典》台湾的《中文大词典》中有些词条，由于照抄《佩文韵府》《渊鉴类函》等类书的材料，不作鉴别，不加核对，以讹传讹，以非为是，大大降低了词书的质量，影响读者的使用，这是不得不郑重指出引为鉴戒的。针对类书的上述缺点，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的本子，引用材料，必须按其所注出处，进行复核，然后才能征引。唐宋类书保存的佚文秘典今已无从复按者，亦须标明引自何种类书，俾知征引有自，以备参稽。

